

## 人民群众是我们的根<sup>①</sup>

### 讲述者

郑卫标（1925— ），广东中山人。1942年4月参加革命，1971年3月入党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任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战士；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山独立团九连副连长；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珠江专署公安处、中山三角税所、珠海县政府、珠海百货公司、珠海物资局、珠海南水供销社、五桂山区公所工作，历任警长、业务主任、下放干部、供销社主任、区公所副经理。1986年5月离休。



郑卫标

### 少年已知“仇”滋味

我出生于1925年，家乡是现中山南朗东榷村。日军入侵中山后，在我的家乡有驻军，进出村子的路口都有日本鬼子把守。我16岁那年，在家以上山砍柴换钱买米为生，时常感到生活很艰难，几乎难以为继。每次进出村口，都要向日本鬼子鞠躬，不鞠躬不让行，夜晚更加不敢出来。在自己家门口受欺凌，经常使我感到耻辱和愤怒。那时我已经尝到国仇家恨的滋味。

1939年日军曾经两次进攻横门。在统一战线下，中山军民奋起抗击，连续打退日军入侵的故事时常激励着我。而“抗先”（广东青年抗日先锋

<sup>①</sup> 根据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2014年4月17日采访郑卫标整理。采访者黄春华、李丽静、林伟桦、吴炜娟；林伟桦整理。采访地点为中山石岐郑卫标家中。



日军在中山抢掠。

队中山县队)对我的影响最大。因为“抗先”队员有很多华侨子女,家庭条件都不错,但他们都拿着命去抗日。我经常想:“我是穷苦人家的孩子,又是五桂山人,如果能参加抗日,我有什么可害怕的。”

有一天,我的同乡麦红军回到家乡(他此时已参加了革命),看到我以砍柴过活,就让我跟他一起进山区。虽然当时没说去革命,但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。就这样,我抓住了保家卫国的难得机遇,在1942年17岁这年参加了革命,到了五桂山区。

刚到部队时,我什么情况都不知道,后来才慢慢了解。我参加的部队叫“孔雀队”,驻扎在大寮周屋。刘南是教官。他很早就参加革命。刚进去时这支队伍有30来人。进去后学军事,操练,学用枪。当时没打过什么仗,经常打仗是到1943年后,攻打翠微、江防队、南朗等。

### 扎根群众,我们才能存在

五桂山并不是很大。我们部队的活动范围一般在五桂山、凤凰山一带,黄杨山去得比较少。日、伪军对游击队的存在深深感到威胁,想尽办法要消灭我们,对游击队发动了“十路围攻”、“五九扫荡”、“六路围攻”等,每次围攻都纠集上万人,真正的鬼子兵并不多,大多数是伪军。鬼子兵并不可怕,威胁更大的反而是伪军,因为他们人数多,对地方情况很熟悉。日本鬼子要入侵一个地方,都很有计划,先派汉奸侦查,哪条村哪条巷有什么人,都事先摸清楚。这就是日本鬼子的诡计,用中国人打中国人。但是,日、伪军对我们围攻这么多次,为什么消灭不了我们,每次围攻都被我们打破?根本原因就是人民群众帮助我们。

五桂山居住的多数是客家人。他们思想觉悟很高,绝大多数拥护中国

共产党。敌人来围攻我们，有多少人来，从哪里来，群众都通报给我们，使我们很快就能掌握情况。五桂山都是通的，容易撤退。游击队的作战方针是：坚持知己知彼，能打则打，不能打则避，不跟敌人硬碰硬。敌人一进入五桂山，我们就先暂避锋芒。他们人多，武器装备好，我们武器差，容易吃亏。敌人一走，就实行小股骚扰。我们十分珍惜子弹，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是我们的宗旨。骚扰敌人时，有时我们用炮仗扔进罐子，噼里啪啦假装打枪吓唬敌人。进入五桂山后，日本鬼子很少敢在山里过夜，敢过夜的都是伪军，一般在翠亨、石门九堡这些地方过夜。敌人发现不了我们，经常扑空，最多持续2、3天就撤退，所以每次围攻均以失败告终。敌人走后，我们迅速集中，研究反击骚扰战术，特别是打击外围的伪军。这些帮凶的威胁很大。每次围攻都没办法消灭我们，根本的一条是我们的群众基础好。如果没有群众支持，支撑不了那么久。当敌人来围攻，我们上了山，游击队的粮食全部都是群众供应。五桂山的老百姓是游击队能存在的根本原因。

有一次，我和3名战士每人一支短枪到外沙收税遇险，多亏群众帮忙才能脱险。那天下午大概5、6点，鬼头仔（汉奸）通知了伪军。有一个中队的伪军即来围攻我们。我们4个人兵分两路突围。我和另外一人往淇澳沙滩方向跑。另外两人往其他方向跑。他们一出公路就被发现，牺牲在马路上，这我们后来才知道。我们两个一路跑到海边，躲进了红树林。敌人沿着足迹追寻而来，但不敢下林搜索，就在外围开枪扫射。我们躲在林里面看到沙滩上人头涌涌，泡在水里一动不动，一直到晚上11点左右。

后来，我们趁着涨水浮走了。到岸后，一直上到翠亨现在烈士陵园旁的那座山。从山上往下看，能看到很多敌人。但我们又冷又饿，全身是泥，不得不冒险到石门近山边的一条村，向群众拿了盒火柴，然后又上山，在山坑洗了澡，取了暖。后来我们继续沿着山脉往上，到了贺婶那条村。贺婶见到我们，骂我们“太大胆，到处是敌人，怎敢这么早跑出来”。她帮我们准备了点冷饭。吃完我们便匆匆离开，沿途向群众打听部队下落，后来安全归队。

五桂山每条村都有支援游击队的事例，白石岗的贺婶是其中的代表。贺婶名叫贺带，是个华侨眷属，一个人在家里，丈夫在外谋生。她经常支

援我们粮食、帮游击队掩护和护养伤员，对待战士像母亲对待自己的孩子。我们也像对母亲一样对待她。可惜的是，1949年，她与丈夫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，没能亲眼看到新中国的成立。

### 挺进东江，为民请命赢赞誉

珠江纵队战略转移，我跟着部队去了东江，当时我在“孔雀队”。部队在宝安黄田上岸，驻扎到燕川。老百姓听过珠江纵队很能打，见到我们来，都热烈欢迎。当时在沙井驻扎了一支伪军——陈培伪军，经常抢群众的牛和家禽，无恶不作。老百姓没有牛就无法耕田，所以群众最痛恨他们。我们的部队一到那儿，就有群众前来请愿，请求赶走这支伪军。

部队指挥员欧初、罗章有立即组织部队研究这个问题。我们在山区时没有打过攻坚战，都是打游击战。怎么打呢？研究过后，我们戒严了燕川整个地方，然后开始练兵，练习打巷战、打攻坚，练习用两头尖的锄头凿穿墙，由屋背跳过屋背，练了7天。沙井那边产蚝，陈培伪军的碉堡都是用蚝壳筑的，实心，很坚固。一条街碉堡林立，易守难攻。敌人人多枪械好。我们只有110多人，部分还是非战斗人员，于是只好找来当地的民兵一起作战。民兵的武器也很差，都是些打鸟的枪，但也得派上用场，让他们守外围。

战斗一开打，就牺牲了一名战士。这名战士我们都叫他“歌王”。他是被碉堡里的机枪扫射到的。伪军驻守的村子里，每隔50米就有一个碉堡。他们用碉堡筑“长城”。

要攻下敌人阵地，始终还是要用炮轰。我们没有携带重炮，就在当地找了一条清朝时留下的土炮，炮手还是请的当地人。我们将这门土炮推到村子对面的荔枝园山，第一炮打断了伪军驻守的祠堂门口的一条柱子，第二炮开始就不行了，老打不中。怎么办？战斗开始前，我们在当地还找到一门迫击炮，但是没有炮弹。部队就派人开船回中山崖口运炮弹。1944年我们在五桂山攻打江防队<sup>①</sup>时，缴过一门迫击炮。当时把它放在船上，随着水流漂走了，但炮弹还在，埋在崖口的沙滩上。炮弹运回来后，却由于

<sup>①</sup> 即汪伪广州要塞司令部横门江防基地。

埋的时间太长，潮湿了，打不着，要干燥得好多天。后来，我们的部队摸到碉堡边的一个闸门，放置了炸药包，“蹦”一声炸开了一个闸门。我们攻进去里面的祠堂，解决了里面的人。

守在外围的民兵却被逃跑的陈培伪军突破了一个口。民兵跑来报告，说陈培跑了。由于情报并不确切，我们不敢立刻大胆追。当了解清楚后才追出去，只见伪军一两百人沿着荷塘边如丧家之犬逃跑。我们在2、3公里外开枪已经无济于事。就这样，战斗打了3天3夜，终于为民除了一大害。战斗结束后，老百姓捉了陈培的小老婆，让她带去她家农场，全部拿回被抢去的牛和家禽等。当地的老百姓盛赞我们“珠江部队，好嘢（好样的）”。以前作威作福的陈培伪军被我们打跑了，因此“珠纵”在老百姓当中威信非常高。

那是1945年荔枝成熟的季节。这场战斗打完后，部队在燕川整队。那时中山的武装已经撤走，留下的是地下党、宣传员等非武装人员。形势需要一些有群众基础的人回撤中山。就这样我被抽调了回去，开始潜伏下来，蓄积力量，等待新中国成立前的革命斗争任务。

#### 【延伸阅读】

## 广东省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山县队

广东省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山县队（简称县“抗先”）于1938年12月9日，即“一二·九运动”3周年纪念日，在县立第七小学（四区西柵）举行成立大会。全县各区乡党的“抗先”队员2000多人参加。县“抗先”是在中共中山县委领导下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中山县抗日群众组织，队员有3000多人。当时，考虑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，总队长由国民党中山县长张惠长担任，副总队长由当时中共中山县委书记孙康担任。县“抗先”设执行委员会，由国、共双方人士联合组成，下设秘书组、组织组和宣传组，由我方派人士任职并负责处理日常工作。县“抗先”按照组织章程，采用全省统一的队徽、队旗、队歌。县“抗先”总部成立党支



位于中山火炬开发区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山县队成立旧址（西樵小学）

部，由县委直接领导。总部初期设在石岐县立第一中学内，后迁至孙文东路44号的一所庙宇。各区还先后成立区“抗先”队。

县“抗先”成立后，积极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。他们上街头、下农村，用演剧、唱歌、编刊物、出墙报等形式，唤起民众抗日热潮，成为当时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主力军。同时还组织武装队伍，参加横门保卫战，抗击日军侵略。“抗先”在抗日群众中影响比较大，是全县规模最大的群众性抗日团体。可是在1939年底，随着国民党反动派反共逆流的到来，“抗先”被国民党中山县当局无理迫害。至1940年2月，甚至将之强行解散。至此，成立只有一年多的中山“抗先”队伍分散转入地下活动。

（摘自《五桂烽火》，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、纪念珠纵成立五十周年筹备组合编，1995年。）